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2, 2025, pp.264-274.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9>



规训、符号化与隐性共谋：

《洛丽塔》中父权秩序的“囚笼”与女性心理创伤

黄思涵(Huang Sihan)，张连桥(Zhang Lianqiao)

摘要：洛丽塔的精神认知受到母亲夏洛特、继父亨伯特、奎尔蒂以及所接受的集体教育四层父权力量的异化影响。福柯通过对不同社会领域与历史语境的比较考察，揭示了权力运作的多种形态：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知识权力、话语权力以及主权权力在人际互动中的创伤性。《洛丽塔》中呈现出一种嵌套性的“父权牢笼”规训：从小我家庭内部母亲夏洛特的教育规训，到小我情感关系里亨伯特在想象层面将洛丽塔符号化的控制，再到社会机制层面的隐性纵容，如剧作家奎尔蒂的影视权力、比尔兹利学校的教育原则，洛丽塔的心理异化正是由这些权力力量叠加规训造成的。

关键词：《洛丽塔》；心理创伤成因；父权规训；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女性形象的神化

作者简介：黄思涵，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电邮：815143657@qq.com。张连桥（通讯作者），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电邮：zhanglianqiao@gzhu.com。

Title: Discipline, Symbolization, and Implicit Complicity: The “Cage” of Patriarchal Order and Female Psychological Trauma in *Lolita*

Abstract: Lolita’s spirit is influenced by the alienation of four patriarchal forces: her mother Charlotte, her stepfather Humbert, Quilty and the collective education power she receives. Foucault reveals various forms of power operation through different social fields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disciplinary power, life power, knowledge power, discourse power, and sovereign power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Lolita* presents a nested “paternal cage”: from the internal

educational discipline of mother Charlotte within private family to the symbolic control of private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Humbert at the level of the imaginary, and then to the implicit indulgence at the social mechanism level, such as Quilty's power as a screenwriter, Beardsley School's education principles. Lolita's psychological alienation is caused by the superimposition of these educational powers.

Keywords: *Lolita*; Trauma Origins; Patriarchal Discipline; Capitalist Consumer Culture; The Deification of Female Images

Author Biography: Huang Sihan,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815143657@qq.com. Zhang Lianqiao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E-mail: zhanglianqiao@gzhu.com.

引言

自 1955 年问世以来,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 的《洛丽塔》(*Lolita*) 便始终是文学界争议与研究的焦点。这部以亨伯特 (Humbert) 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的小说, 表面讲述了四十岁的法国文学教授亨伯特对十二岁少女洛丽塔 (*Lolita*) 畸形的欲念, 实则用尖锐的笔触剖开了父权社会的权力肌理, 描述了洛丽塔从天真孩童沦为精神废墟上的“失语者”, 并挣扎着从创伤中成长的过程。其人生中的悲剧绝非个体欲望失控的偶然结果, 而是父权规训在家庭、亲密关系、社会机构与文化工业中层层嵌套、合力绞杀的必然产物。

“父权”作为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系统性权力结构, 通过家庭、教育、媒体等社会场域, 将“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性别秩序制度化, 既赋予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权, 又通过标准化的价值体系, 如“淑女规范”“女性天职”“女神化”等符号化倾向实现对女性的驯化, 而这种驯化的实现, 离不开“规训权力”这一关键机制。米歇尔·福柯 (2019) 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 规训权力并非显性的暴力压制, 而是通过空间区隔、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微观技术, 将权力渗透到个体的身体与意识之中, 从知识、身体、性各个层面瓦解人的主体性, 最终造就“驯顺的主体”。正如 Alen Širca (2017) 在对福柯方法论的精读中所揭示的, 这种权力分析并非简单地以“断裂”或“离散”来对抗“连续”, 而是旨在探究两者得以形成的共同条件, 从而“描述其他统一体”, 即那些受控于特定规则、虽不可见却真实存在的“话语群”。陈沿西 (2009) 以《洛丽塔》为个案, 指出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控制, 正是通过“空间隔离 (汽车与旅馆构成的移动监狱)、话语压制 (定义‘父女’关系以合理化支配)、惩罚机制 (暴力与威胁)”等规训手段实现, 最终使洛丽塔沦为“权力网络中的失语者”。赵利娟、支冉 (2019) 揭示了《洛丽塔》中美国消费社会如何通过家庭、学校与大众媒体将商品符号化, 使洛丽塔在物质至上与享乐主义中丧失主体性, 成为父权制的“被观赏者”。

无论是家庭场域里, 母亲夏洛特 (Charlotte) 以“淑女培养”为名的规训、继父亨伯特以“欧洲艺术”为名的爱情圈养, 还是社会场域里奎尔蒂 (Quilty) 利用美国娱乐文化工业, 以“梦想诱饵”为表的操控、比尔兹利女子学校以“社交训练”为实的教育驯化, 它们都共同将洛丽塔推向主体性丧失的深渊。鉴于此, 本文以“父权批判”为核心切入点, 结合福柯权力理论与创伤研究视角, 系统剖析洛丽塔心理创伤的成因。通过梳理家庭 (夏洛特)、亲密关系 (亨伯特)、文化工业 (奎尔蒂)

与社会机构（比尔兹利女子学校）四个场域中，父权规训如何以显性规训与隐性渗透的方式制造精神创伤，揭示这些权力机制如何在个体心理层面形成叠加效应，最终导致洛丽塔的自我认同崩解与情感结构扭曲。

一、夏洛特：家庭关系中的功利主义规训与情感冷漠

洛丽塔在社会场域中接触的首个对象，是她的亲生母亲夏洛特——作为资本主义父权制度规训下的典型产物，夏洛特身上烙印着鲜明的被驯化特质，而她对洛丽塔的桎梏，正是父权逻辑的代际化演绎：她既以规训者的身份将资本主义父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凌驾于洛丽塔自身个性之上，又作为被规训者深陷制度桎梏，最终让母亲之爱成为年幼洛丽塔的精神创伤。从夏洛特被驯化的特质来看，她秉持功利主义婚姻观，将婚姻视作阶层跃迁的工具，先是嫁给年长自己二十岁且有异常性习惯的哈罗德·黑兹（Harold Haze），后又企图通过与博学知识分子亨伯特结婚提升社会地位；她还表现出附庸风雅的文化姿态，刻意维持矫饰的优雅，热衷读书俱乐部等组织却缺乏真实思想，在对女儿洛丽塔的教育中奉行僵化的资产阶级道德规训标准。

夏洛特用社会规训中“好女孩”的标准塑造洛丽塔——要求她举止严谨得体，在性意识上保持保守与羞耻。她甚至用法语告诫女儿“别露出你的腿”，那句“多洛蕾丝·黑兹，ne montrez pas vos zhambes”（p.68）^①里，“zhambes”的拼写错误（应为“jambes”），就像她教育方式的隐喻：既想借用知识权威规范束缚女儿，自身却早已在僵化的规训中失却了真正的规范能力。纳博科夫刻意植入外语错误来表现夏洛特的美国口音，恰恰撕开了夏洛特作为母亲在教育洛丽塔上的虚伪。对“外语”的滥用本就是一种权力炫耀（用小众语言拉开与普通人的距离），而语法错误的存在则消解了这种炫耀：她试图用语言的“高级感”合理化自己用教养控制女儿的欲望，却被语言本身的“不完美”揭穿了其内在的虚伪。夏洛特·黑兹一面用流行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贵族那种浮夸矫饰的法语教女儿矜持守礼，一面又试图用这门语言讨好身为法语文学教授的亨伯特——这种附庸风雅的姿态，在“教育女儿的刻板规训”与“取悦男性的刻意逢迎”之间形成了刺眼的对照。在《独抒己见》（2023）中，纳博科夫说明“黑兹 Haze”这个姓氏有“爱尔兰雾”之意。但这层含义只有在爱尔兰英语语境中成立，在爱尔兰本地盖尔民族语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这一巧妙的文字游戏，暗讽夏洛特对欧洲文化的追捧，就像被殖民地对宗主国文化的崇拜。

“ne montrez pas vos zhambes”（不要露出你的腿）在后文中又出现了一次，但不是出自夏洛特之口，而是亨伯特借旧杂志之口戏仿夏洛特的法语指令“ne montrez pas vos zhambes”（p.296），亨伯特通过这一语言，将自己带着洛丽塔去看牙的场景变得充满禁忌与炫耀意味，强化了“成人世界用外语对儿童说禁令”的暧昧和不平等。“旧杂志”在小说中象征了杂交的知识话语规训权力，最开始出现于亨伯特第一次来到夏洛特家，他对其家庭氛围的描述：“在这种家庭里，每张椅子上都放着翻脏了的旧杂志，还有一种叫人厌恶的杂交气氛：一面是所谓‘实用的现代家具’这种喜剧因素，一面又是破旧的摇椅和上面放着开不亮的台灯的摇摇晃晃的灯桌这种悲剧因素”（p.58）。现代家具与腐朽的旧日杂志还有怀旧家具混杂在一起，让空间显得既滑稽又凄凉，本质是资本主义父权规训的“表面现代实用性”与“内在怀旧腐朽性”的撕裂，犹如一段由物质生产力推动发展，却在“旧杂志”推动下不断低维重复的父权历史。

^①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2005）：《洛丽塔》，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夏洛特试图通过标准化的知识教育将女儿培养成契合“旧杂志”女性标准的人。她用心地阅读并回答芝加哥出版的教育书籍《子女成长指南》上的问题，在填写书籍上提供的年表时，她在“子女个性”一栏的四十个形容词中，只选中了寻衅生事的、吵吵闹闹的、爱找岔子的等十个负面词汇，其中“不听话的”还划了两道线，却对快活的、乐意合作的、精力旺盛等三十个积极形容词视而不见（p.127）。夏洛特对女儿的评判充满了偏见与否定，她在对女儿的教育中强调“听话”甚于“精力”。这种用片面化、手册化的标签消解女儿主体性的行为是对洛丽塔真实个性的无视与否定，让洛丽塔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母亲对自己真实存在的认可，加剧了她内心的不安与自我怀疑。

夏洛特·黑兹对教育指南书籍的重视与她对洛丽塔玩具的无视与厌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洛的一些小玩意儿胡乱地散乱放在房子里各个不同角落，就像好多受了催眠的小兔子似的呆着不动”（p.127），这些玩意是洛丽塔童心的载体与象征。但夏洛特却以在其他情况下从未有过的蛮横态度处理和清除它们。玩具的“被催眠”是洛丽塔童心被禁锢的隐喻——在夏洛特眼中，女儿的童真远不如“规训成果”重要，这种价值排序本身就是对儿童天性的暴力。在向读者解读洛丽塔的各个不同称呼蕴意时，纳博科夫（2023）在《独抒己见》解释说，由“多洛莉丝”衍生而来的昵称“多莉”和“黑兹”这个姓氏放在一起就像是“德国小兔”。在德语中，“黑兹 Haze”和“兔子 hase”这个单词同音。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文字语音游戏，其实背后还藏着文字语义游戏的讽刺。《洛丽塔》开篇已经点明：“在学校里，她是多莉”（p.9），多莉在小说里的出现往往与前后文的学校教育语境还有童心相关。“多莉·黑兹”这一称呼暗藏对德国泯灭童心的教育体系的反讽。德国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功利性职业教育是尼采 1872 年的重要批判对象，尼采批判德国标准化考核机制抑制个体的创造性思维。纳博科夫借用德语小兔子“黑兹”的音来暗合尼采对德意志帝国教育的批判以及暗示夏洛特·黑兹给多莉·黑兹带来的教育创伤。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1981 年对《洛丽塔》的戏剧改编之所以被斥为“淫秽”，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纳博科夫原著中，那些藏着“言外之意”的语言游戏，本承载着批判功利化教育的深刻内涵，却在阿尔比的改编中被消解。

夏洛特的教育理念更带着宗教式禁欲色彩，她希望将洛丽塔送进纪律严格、注重正规宗教教育的寄宿学校，试图通过奎夏令营这种更严格的隔离空间来规训女儿，一心想将洛丽塔打造成“旧杂志理想女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同时给自己和亨伯特更多的二人相处时间，她甚至愿意放弃与洛丽塔独一无二的亲情羁绊，将子女教育全权托付给学校：她计划让洛丽塔“从营地就直接进入一所纪律严格的良好寄宿学校，学生在那儿可以受到正规的宗教教育。随后——就进比尔兹利学院”（p.130）。但就是在奎夏令营，洛丽塔受营地女主任 13 岁的儿子查利·霍姆斯（Charlie Holmes）和 11 岁的女孩伊丽莎白·塔尔博特（Elizabeth Talbot）影响，走向了“性早熟”。（p.216-217）

二、亨伯特：爱情幻想下的艺术化占有与主体吞噬

洛丽塔、亨伯特、猴子三者形成了环环相扣的规训牢笼象征关系。“规训的笼子”是整部小说的重要意象，在后记中，纳博科夫说《洛丽塔》的故事受到困于植物园铁笼猴子故事的启迪：经过科学家的驯化，猴子在铁笼上画出了囚禁它自己的铁条（p.496）。亨伯特的创作本身是在监狱体制的监视下进行的。这意味着，即便他试图以创作者的姿态对洛丽塔进行凝视与书写，试图掌控叙事与关系，他自身也处于监狱这一典型的“规训牢笼”之中，受到体制的监视与约束。就像那只画出牢笼铁条的猴子无法真正逃离囚禁一样，亨伯特无论是作为控制者对他人施加规训，还是作为被欲望

与体制双重囚禁的个体，都深陷在“规训牢笼”的循环之中，无法挣脱。作为博学多才的文学教授，亨伯特将古老西欧艺术对女性的神化想象与规训嫁接到洛丽塔身上，如同那只猴子在铁笼上画出囚禁自己的铁条——既是在向洛丽塔施加规训，也是在巩固禁锢自身的牢笼。

亨伯特作为知识分子渴望通过知识规训并囚禁他人，这一倾向在他以学术知识旁观他人苦难的经历中得到了体现和拓展：他听闻前妻瓦莱尼亚（Valeria）与现任丈夫马克西莫维奇（Maximovich），早在1945年前就被美国人种学家关在房间里，沦为入种实验的研究对象；而他自己，竟还想从《人类学评论》里翻找那些实验的结果（p.48）。亨伯特试图从学术文献中旁观凝视前妻作为学术实验对象的实验过程与结果，以此满足自己的报复欲，这种行为模式与他从艺术角度凝视洛丽塔、满足创作欲的方式极为相似。在这两种情境中，亨伯特都试图通过“凝视”与“记录”他者（无论是学术文献的查阅还是对洛丽塔的艺术化书写）来实现对对象的掌控，将具体的他人纳入自己笼统的认知与欲望框架中，这是一种理念知识上的规训。以理念知识为媒介的规训本质上是通过宏观符号系统来组织、分类和控制人类经验，与拉康所提出的象征界核心功能相呼应——赋予意义、建立秩序、规范主体身份。法律、历史、文化规范等象征系统本应提供普遍的意义框架与合法性，并对个体的想象界欲望形成约束。然而，亨伯特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象征界的弹性与漏洞来支撑其想象界的欲望，如对比英国1933年《儿童和青少年法案》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对“孩子”年纪定义的法律，暗示法律不同、边界不同，他与洛丽塔的肉体接触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并不必然构成犯罪（p.28）。

这种通过操纵象征界资源来支撑想象界欲望的策略，在亨伯特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学创作实践主要发生在象征界内（语法、词汇、修辞、叙事结构等社会共享的符号系统），但文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能同时调动个人想象界的创造力并触及实在界的不可言说之处。作为文学教授，亨伯特企图利用美学修辞想象“爱情”，触及实在界不可言说的快感，他将这种抽象追求寄生在与洛丽塔的私人关系上，与《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和莱昂通过夸张情书与情话建立的通奸关系相似。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认为“如果挑出《包法利夫人》中写到马的段落，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得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对于今天的象征主义来说，“敞篷汽车”也许比马更具有象征意义。（Nabokov, 2018, p.281-284）“马”在《包法利夫人》中象征爱玛对浪漫爱情的渴望，对平庸现实束缚的反抗，暗示她与不同男性关系的发展，映射她从追求理想爱情到道德堕落的整个过程。纳博科夫对汽车意象的处理明显借鉴了《包法利夫人》：汽车作为贯穿《洛丽塔》、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既是亨伯特逃离世俗世界，追寻浪漫理想的交通工具，也是亨伯特隔离控制洛丽塔的规训空间，映射了亨伯特从追求理想爱情（侵占洛丽塔）到“毁灭式落幕”整个过程。在亨伯特、艾玛（Emma）和莱昂（Léon）的爱情追求中，抽象的理想伴侣形象侵吞着具体的个人。当他们通过想象他者的身体感官来联接自己的理想时，“他者即地狱”的大门便开启。如亨伯特对“性感少女”的身体进行监视：头发、眼睛、胳膊、膝盖、腿、腋毛，并将这些身体部位转换成美学语言：“我空虚的灵魂却设法把她的鲜明艳丽的姿色全都吸收进去，又拿每个细微之处去和我死去的小新娘的容貌核对比照。”（p.61）他将9至14岁的少女定义为“性感少女”（nymphet），其词源指向古希腊神话中的仙女（宁芙），并将她们的形象禁锢在“唯我想象界”的“仙女岛”上，这是典型的镜像误认式凝视。

这种凝视方式在《包法利夫人》中同样存在。莱昂凝视近在眼前的艾玛时，看到的只是艺术倒影中泛指的理想者“她”，他对艾玛的凝视与亨伯特看待洛丽塔的方式极为相似：“她就是所有小说

中的情人，所有剧本中的女主角，所有诗集中泛指‘她’。他在她的肩头看到了‘土耳其入浴宫女’的琥珀色皮肤；她有封建城堡女主人的细长腰身；她也像西班牙名画中‘脸色苍白的女人’但是说来说去，她总是天使”（Flaubert, 2018, p.292）。相似地，艾玛对莱昂的爱也并非针对具体对象，“在写信的时候，她看到的并不是莱昂，而是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由她最亲热的回忆、最美丽的读物、最强烈的欲望交织而成的幻象”（Flaubert, 2018, p.321）。纳博科夫在《洛丽塔》继承并发展了《包法利夫人》里文艺知识分子借对他人的想象投射自身情欲的行为，这种行为发展到极致便是“恋童”。亨伯特选择儿童作为投射对象并非偶然：儿童正处于对世界充满期待的阶段，其蓬勃的想象力本应是自我探索的动力，却被亨伯特扭曲为可利用的特质——他正是借助儿童的天真与想象，为自己的情欲投射编织了“纯洁”“灵性”的伪装，让病态的占有欲在“美学想象”的外衣下更具迷惑性。

但悖论在于亨伯特、艾玛、莱昂所谓美好浪漫的爱情理想都是在资本主义父权社会规训中生成的消费理想，要以剥削、客体化具体他人为代价来填充自身想象。可个人真正的精神理想，本应是带着自己生命体温的独特风格创造，是具有生产性的自我投射，而非流水线上标准化的欲望商品，它永远无法通过消费他人、挪用他者主体性的方式得到满足。亨伯特投射在洛丽塔身上“理想爱情”并非自发的情感，其实是被社会规训（资本的消费模板+父权的客体化逻辑）预先编写的“程序”。欧洲西方古典艺术长期将“少女”（尤其是青春期前的女性）塑造成“纯洁、灵性、永恒之美”的符号，这种文化想象潜移默化地规训着对少女的认知，为亨伯特的“仙女”执念提供了美学模板。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社会仍处于强父权结构中，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或“欲望客体”，这种社会规训也为亨伯特的控制欲与占有欲提供了隐性支撑。在亨伯特性侵洛丽塔的那一刻，他对洛丽塔的凝视积聚了他先前对女童的语言幻想。对于亨伯特而言，“寻找一个‘海滨王国’，一个‘理想化的里维埃拉’或诸如此类的地方已经完全不是下意识的冲动，而成了对纯理论的欢乐的合理追求。”（p.262）他看到的不是洛丽塔真实具体的肉体，只是一副用来承托自身艺术想象的空壳。洛丽塔这一生遇到许多的人都想将其归纳分类成某种统一化、普遍化的概念，她具体运动着的独特性常常被忽略。

在爱德华·阿尔比改编的《洛丽塔》戏剧当中，洛丽塔的形象被矮化成“瘦骨嶙峋、满口脏话、手肘外凸、膝盖相撞的女孩”。（Ben, 1981, p. 78）爱德华·阿尔比本想通过这种方式凸显亨伯特的语言艺术对洛丽塔的神化作用，以此让观众体会艺术的伟大，从而向观众确定亨伯特作为艺术家的道德性。但他恰恰在舞台上将亨伯特“以美学修辞遮蔽主体侵占”的本质具象化，并在强调亨伯特高超艺术技巧的过程中忽略了他艺术理想的盲目性和悲剧性，激起了观众对艺术虚构现实更深切的厌恶，正如 Albee（1981, p. 14-15）在现场看见：“每当舞台上洛丽塔背对着观众、敞开睡袍向亨伯特展露自己的那一刻，总会有一两对观众怒气冲冲地起身离场”。

三、奎尔蒂：明星梦中的影视工业操控与性剥削

奎尔蒂以“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身份和好莱坞影视行业运作模式为掩护，借助影视工业的权力外衣、“好莱坞梦工厂”的造梦机制、洛丽塔的演员梦想以及社会文化中潜藏的父权规训逻辑，对洛丽塔实施了系统性的精神操控与肉体占有。他给洛丽塔带来的根本性创伤在于：不仅以“艺术”包装自身淫欲，更通过消费文化塑造虚假的“成功模型”，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与规训嵌入洛丽塔自我建构的成功想象与欲望之中，最终使她在自我异化中沦为父权游戏的牺牲品。

奎尔蒂活跃于好莱坞，而洛丽塔的成长环境恰好被好莱坞电影文化以及与之共生的商业娱乐文化团团包围：洛丽塔的房间床头的墙上钉着“从一本华而不实的杂志上扯下的一整页广告”，钉子“正好在一个低吟歌手的嘴和一个电影女演员的眼睫毛之间。”(p.106) 这页杂志是洛丽塔根据自己的喜好布置的房间元素，符合青春期少女的生活场景设定。她把杂志钉在墙上，等于把好莱坞的虚构剧本搬进自己的私密剧场，她通过裁剪、张贴这些虚构影像，在自己的“私密剧场”里排练对“成熟关系”的想象，却对其中暗含的父权规训毫无察觉。这页杂志广告上就有奎尔蒂“正一本正经地抽骆驼牌香烟”的形象。对怀揣演员梦的洛丽塔而言，奎尔蒂的“剧作家”身份是通往梦想的钥匙。但她未曾察觉，这张广告页里藏着父权的陷阱，在奎尔蒂的香烟广告之上：爱尔兰丈夫神色衰竭，正在试穿公司制作的晨衣，他手里托着的餐盘里摆了两份早餐，妻子作为“那个被彻底征服的女人大概正半撑起身子来拿她在托盘里的一份早餐”(p.106)，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式家庭场景虚构——用看似温情的日常，包装出一种程式化的“亲密关系”模板。纳博科夫在对广告餐盘的描述中嵌入托马斯·莫雷尔(Thomas Morell)《看啊，征服的英雄来了》、《尤利西斯》中布莱泽斯·博伊兰(Blazes Boylan)勾引已婚女人的情节，强化了艺术文化中女性被男性“征服”与“诱惑”的主题书写，这就是妻子从爱尔兰丈夫那拿到的“早餐”。广告海报上奎尔蒂的影像与“洛的纯洁的床”、“连环漫画书”这些童真物象并置形成反讽。洛丽塔在这页杂志用箭头标记奎尔蒂和亨·亨的相似之处，这一看似无意的举动，实则暴露了她已被父权凝视规训：她学会了用男性的标准审视男性，却意识不到自己正是这种审视的最终目标。亨伯特自诩审美者，奎尔蒂玩弄明星梦，他们在镜中互为倒影，而洛丽塔被迫站在广告与床之间，成为消费文化的祭品。

奎尔蒂给洛丽塔带来的创伤性，更在于他将父权社会对他人的剥削行为编码为“艺术创作”，让暴力披上“美学”的外衣。奎尔蒂公开发行的知名儿童剧与其私下唆使儿童拍摄的禁片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给社会看的“道德范本”，后者则是他实施虐待的实践行动。小说明确提到，剧作家奎尔蒂“曾用《朱斯蒂娜》和十八世纪其他描写越轨性行为的作品拍摄成好几部不公开的影片”(p.478)，而萨德(Sade)笔下《朱斯蒂娜》的女主人公，本质上正是为满足父权制下那些以虐待下位者为乐的上位者而存在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萨德的艺术创作本身具有复杂的批判意涵：他笔下对上位者冲破道德规范成为施虐狂的书写，是对18世纪启蒙思想与宗教道德的反叛，其对性别关系的极端呈现可视为一种“以毒攻毒”的哲学实验——即通过放大父权社会中潜藏的权力暴力，揭露其禁欲表象下的虚伪性，因而具备一定的社会批判性。但奎尔蒂却完全剥离了萨德作品的这一批判属性，仅将《朱斯蒂娜》的剧本转化为合理化自身剥削行为的工具，彻底消解了原作的思想价值。纳博科夫对奎尔蒂这种“虚伪性”的描绘，与其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判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弗洛伊德(Freud)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与伊拉克特拉情结理论，一方面确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父权社会中家庭关系所潜藏的糜烂与精神创伤；但另一方面，该理论又不断暗示人们将本该以温情为核心的家庭关系，扭曲为“争宠式”权力斗争——这种解读最终使理论沦为合理化混乱家庭关系的工具，与奎尔蒂对萨德作品的挪用形成了同构的批判指向。亨伯特持枪质问奎尔蒂时，奎尔蒂的回应——“别拿生死闹着玩。我是一个剧作家。我写过悲剧、喜剧、幻想剧”、“我知道所有的窍门。让我来处理这件事。”(p.478)——则将创伤推向极致：他不仅不否认对洛丽塔的伤害，反而用“剧作家”的身份将其定义为“可处理的剧情”。在他“将人视为文本”的冷漠逻辑里，洛丽塔的命运与《朱斯蒂娜》的剧本一样，只需按照套路推进，无需考虑她的感受。

美国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在对《洛丽塔》的戏剧改编中不自觉将自身代入奎尔蒂的“剧作家”角色，与奎尔蒂形成微妙的镜像关系：正如奎尔蒂将洛丽塔的命运视作“可编排的剧情”，阿尔比也通过在戏剧中新增兼具纳博科夫与自身特质的创作者形象——“某位特定绅士”，掌控着舞台上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叙事走向，用“亨伯特与‘作者’的关系取代原著中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关系”。（Ben, 1981, p. 79）在纳博科夫撰写的《洛丽塔》电影剧本中，纳博科夫把自己写成洛丽塔和亨伯特在路中偶遇的一个抓蝴蝶的家伙，洛丽塔和亨伯特完全不认识他。Albee（1981, p. 10）曾坦言改编目标是“写出纳博科夫若为剧作家会创作的剧本”，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纳博科夫若在世会让改编“变得更困难、成本更高”。他试图以“双重创作者”身份主导文本阐释，与奎尔蒂剥离萨德作品批判属性、独占文本解读权的行为相似。

奎尔蒂用“影视圈大佬”的身份制造“光环效应”距离感，又以“试镜”、“合作拍戏”等名义拉近自己与洛丽塔的距离。当他在网球场欺骗洛丽塔，说要带她去好莱坞“为《金色的肚子》影片中的网球场景试镜”（p.441）时，正是利用了少女对“电影明星”身份的渴望。这种“梦想诱饵”比亨伯特的强制控制更具隐蔽性——洛丽塔以为自己在主动追逐未来，实则一步步走进奎尔蒂用艺术话语编织的好莱坞大众文化工业牢笼：大众文化用“虚构的美好”驯化个体，让被压迫者将压迫视为“机遇”，而奎尔蒂正是这种文化的“完美生产者”。洛丽塔对好莱坞的想象，本就源于杂志广告、电影片段等二手经验，这些内容早已被父权视角过滤：女性要么是“被彻底征服的妻子”（如早餐广告中的形象），要么是“弧光灯下的小女明星”（如奎尔蒂承诺的角色），本质都是被观看、被异化的对象。奎尔蒂利用这种认知盲区，将“试镜”变成性剥削的借口，将“拍戏”转化为权力控制的场域。

奎尔蒂对洛丽塔的创伤，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父权社会与大众文化合谋的产物。好莱坞作为当时美国文化的核心场域，本身就充满了“权力与欲望”的交易：好莱坞“施瓦布杂货店”作为“电影从业人员和渴望进入电影业的人集会的场所”（p.219），见证了无数像洛丽塔这样期望得到大佬赏识的少女的挣扎。这种“等待被挑选”的文化氛围，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将成功定义为“被男性权力认可”，将价值简化为“被观看的魅力”。当洛丽塔在亨伯特即将性侵她的酒店大厅里“埋头在看一本装帧俗艳的电影杂志”（p.219）时，小说所第一次提及奎尔蒂与洛丽塔的相遇，就发生在这种“权力不对等”的语境中：她沉浸在奎尔蒂虚构的“明星梦”里，而奎尔蒂正与圈内人谈笑风生，将她纳入“待捕猎”的名单。

四、比尔兹利女子学校：学校教育中的伪科学管理与社交驯化

比尔兹利女子学校，看似是传授知识、培养淑女的教育机构，实则是父权压迫的隐秘实施地。这一环境从教育理念、社交规训、师生关系等多个维度，对洛丽塔施加了无形却深刻的压迫与创伤。

比尔兹利女子学校宣称是一所高级女子学校，收费昂贵，还设有令人向往的体育馆，看似提供优质教育，但其教育理念却令人失望。女校长普拉特（Pratt）向亨伯特阐述学校的教育方针时，强调“四个D”，即演戏（Dramatics）、舞蹈（Dance）、辩论（Debating）和约会（Dating），认为孩子适应集体生活的能力比学术知识更重要。她认为对于现代青春前期的儿童来说，中世纪的日期不如周末的约会有价值，甚至宣称女学生应该“跟周围的生气蓬勃的世界自由地交际，而不是一头扎进发霉的旧书堆里”（p.277）。这种教育理念完全忽视了洛丽塔的个性与求知欲。洛丽塔虽然不爱阅读

那些超出她兴趣范围的高深文学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求知的渴望。从她对连环漫画册和美国妇女杂志上故事的喜爱可以看出，她有自己对故事向往的需求。洛丽塔同样存在思考严肃文学中生死、生命等哲学议题的精神需求：“你知道，死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完全得靠你自己”，“在那极为幼稚的陈词滥调背后，她心中还有一个花园，一道曙光，一座宫殿的大门——朦胧可爱的区域”。

（p.456）然而，比尔兹利学校却没有尝试去引导和激发她对更广泛知识的兴趣，忽略她“愿意欣赏《僵直的姑娘》、《一千零一夜》或《小妇人》”的事实（p.271），甚至强化了她对严肃学习的抵触情绪。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洛丽塔智力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学校清除了传统上摆在年轻姑娘们面前的大量论题，认为它们与安排生活所需的常识、技能和态度无关。比如，普拉特认为对于未来的家庭主妇而言，冰箱在厨房的实用摆放位置比星球的位置更重要（p.277）。

比尔兹利学校通过对学生的社交行为实行严格的享乐训练来塑造洛丽塔这样的女学生成为父权社会所需要的女性。学校强调约会、赴会、赴会服装等社交活动的要素，将其视为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部分。校长普拉特认为多萝西·亨伯德（洛丽塔）已经卷入社会生活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热狗摊、街角的杂货店、麦乳精饮料和可口可乐、电影、方形舞会、海滩铺毯会，甚至还有理发会！”（p.276）“约会”对洛丽塔这样的女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学校的社交规训极大地改变了洛丽塔的自我意识。她本可能有自己的社交观和自我期待，可是学校的教育生活迫使她必须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种社交生活方式上。学校强调约会等社交活动，向洛丽塔传达的一种信息：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她们的社交生活中，取决于她们在这个社交场合中能否吸引男人。这使洛丽塔越发丢失了自己的判断标准，甚至将他人的眼睛和评价作为自己的标准。

比尔兹利女子学校对洛丽塔社交层面的规训还体现在它要求洛丽塔参与学校出于向外界展演作秀的目的而成立的戏剧小组。校长普拉特要求洛丽塔主演《猎获的魔术师》（奎尔蒂所作《着魔的猎人》）（p.309），暗示其想要洛丽塔以“玩乐”的方式在社交场合中呈现自身，成为学校所界定的“现代美国女孩”。此举为奎尔蒂后来接触洛丽塔开辟道路，让学校沦为将洛丽塔推到掠夺者身边的幕后推手。在亨伯特以监护人身份拒绝洛丽塔参加学校主导的戏剧、跳舞等社交活动后，校长普拉特在与亨伯特的交谈中，将亨伯特归为“欧洲的大陆来的一位老派的父亲”（p.305），“入了美国籍的外国人”（p.310），将这位有着欧洲教育背景的流亡者归为“外国人”，并暗示其对美国校园文化及青少年活动的开放并没有了解多少。在她的话语体系里，自身代表美国主流思想的表达，而亨伯特则象征着“欧洲旧世界的保守”，她批评亨伯特不让孩子参加正常的娱乐，间接批驳其僵化的欧洲性伦理思想无法把握美国校园的现代做法，批评他对美国学校的现代举措“视而不见”，这番看似赞扬亨伯特“运用我们丰富语言的那种令人钦佩的方式”（p.310）的表述，实为委婉施压：既然你熟悉美国英语，就该接纳美国孩子的社交逻辑。普拉特以“国籍区隔”推出一套判断标准，强调“美国主流先进的开放学校”和“外来落后的保守家长”之间的对比，是为了给家长施压，说服亨伯特作出让步，实现让洛丽塔适应美国学校社交规训、放纵性欲的目的。

校长普拉特在与亨伯特讨论洛丽塔的性教育问题时，她先提到洛丽塔“肛门和生殖两个区域之间”（p.306）的发育状况，又把话题滑向作为女人“生物和心理的欲望”（p.306），并拿出一叠评分表、行为记录、学校研究人员对洛丽塔的观察评价，仿佛在汇报一台机器的故障。比尔兹利女子学校自称推行开放的性教育，但当需要向家长或当局解释时，却把青春性冲动降格为“哺乳动物的繁殖过程”（p.308），口头上它欢迎学生自然地讨论两性，甚至把恋爱、约会视为与学习同等重要的

“社交技能”；但一旦要为这种教育辩护，却立即转用生物学语言，把性缩减为与动物无异的生理本能。说明它其实并不真正认可健康的两性情感关系，而是把性当成需要被“科学”管控、避免过度浪漫化的生理快感。将性教育包装成“哺乳动物繁殖”，既淡化了性教育的社会与情感维度，也为学校提供了一块“科学”挡箭牌：我们只是在教生理常识，而非鼓励放纵。这种说法折射出当时美国社会对性议题的保守本质，以及教育机构在进步口号与传统道德之间的摇摆。在性观念规训方面，学校对洛丽塔性问题的不当处理，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的禁忌和控制。父权社会既希望女性保持性的纯洁，又在女性出现性发育和性好奇时进行打压和扭曲解读，将女生的性视为一种需要管理和控制的生理资源。

结语

《洛丽塔》这个故事关于以夏洛特·黑兹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禁欲教育、以亨伯特为代表的西欧古典艺术理念、以奎尔蒂为代表的现代美国梦影视娱乐艺术、以比尔兹利女子学校为代表的美国享乐主义教育如何通过思想操控强暴一个出生在二战后的少女洛丽塔。它们在异曲同工的强暴过程中发生竞争关系，相互嫉妒挤压，试图在一个美国年轻少女的脑子里占据一席之地，一方可能宣称“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p.499），另一方可能会说：“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p.499），然后不谋而合地忽视“古老的欧洲”和“年轻的美国”它们的教育共同给洛丽塔带来的父权心理创伤，最终将她的亲情、爱情、友情、童心与求知欲，在父权社会的碾压下扭曲成所谓的“性早熟”，就如爱德华·阿尔比对《洛丽塔》的改编之所以引发戏剧伦理争议，在于其剧本剥离了原著语言的游戏性，爱德华过于强调洛丽塔性诱惑的主动性，将其存在之美归功于亨伯特艺术上的神化，他与其笔下的幽灵作者一起无视洛了丽塔的童心和她的声音。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戏剧中的悖论诗学研究”（项目编号：21YJC752024）系列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Huang Sih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0157-9048>

Zhang Lianqiao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1199-4840>

Reference

施恩·鲍曼（2020）：《高雅好莱坞——从娱乐到艺术》，车致新译。译林出版社。

[Bauman, Shyon (2020). *Highbrow Hollywood: From Entertainment to Art*, trans. Che Zhixin. Yilin Press.]

Ben, Cameron (1981). “Who's Afraid of Vladimir Nabokov?: Edward Albee's ‘Lolita’.” *Theater* (03): 77-80.

陈为艳（2015）：“纳博科夫为什么反对弗洛伊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03）：150-155。

[Chen Weiyan (2015). “Why Nabokov Detests Freud.” *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03): 150-155.]

- 陈沿西 (2009): “规训权力的作用——洛丽塔的悲剧”, 《昭通学院学报》(01): 42-45。
[Chen Yanxi (2009). “On the Role of Disciplinary Power—the Tragedy of Lolita.” *Journal of Zhaotong University* (01): 42-45.]
- Edward, Albee (1984). *Edward Albee's Lolita*.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 Edward, Albee & Mark, Anderson & Earl G., Ingersoll (1981). “Living on the Precipice: A Conversation with Edward Albee.” *Writer Forum Interviews* (03): 1-22.
- 居斯塔夫·福楼拜 (2018): 《包法利夫人》, 许渊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Flaubert, Gustave (2018). *Madame Bovary*, trans. Xu Yuancho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米歇尔·福柯 (2019):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译。新知三联出版社。
[Foucault, Michel (201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Liu Beiche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胡颖峰 (2013): “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权力理论新探”, 《浙江社会科学》(01): 114-145。
[Hu Yingfeng (2013). “Disciplinary Power and Disciplinary Society: New Exploration on Foucault's Power Theory.”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01): 114-145.]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2005): 《洛丽塔》, 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Nabokov, Vladimir (2005). *Lolita*, trans. Zhu Wang. Shanghai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House.]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2021): 《洛丽塔: 电影剧本》, 叶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Nabokov, Vladimir (2021). *Lolita*, trans. Ye Zun. Shanghai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House.]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2023): 《独抒己见》, 唐建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Nabokov, Vladimir (2023). *Solus Rex*, trans. Tang Jiangqing. Shanghai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House.]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2018): 《文学讲稿》, 申慧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Nabokov, Vladimir (2018). *Lectures on Literature*, trans. Shen Huihui et al. Shanghai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House.]
- 弗里德里希·尼采 (2025): 《教育何为》, 李晶浩译。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Nietzsche, Friedrich (2025). *What Is Education For*, trans. Li Jinghao. Wanjuan Publishing Co., Ltd.]
- 萨德 (1994): 《朱斯蒂娜》, 闽乐, 韦虹译。哈尔滨出版社。
[Sade, M. de (1994). *Justine*, trans. Min Le, Wei Hong.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 Širca, Alen (2017). “Discontinuity and Continuity: Literary History According to Foucault.”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02): 236-248.
- 赵利娟、支冉 (2019): “符号经济: 洛丽塔的消费欲望之火”, 《俄罗斯文艺》(02): 126-133。
[Zhao Lijuan, Zhi Ran (2019). “Sign Economy: Fire of Lolita's Consuming Desire.” *Russian Literature & Arts* (02): 126-133.]